

中国文学讲稿

(古代部分)

周先慎 著



中国文学批评稿



(古代部分)

周先慎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讲稿(二)

周先慎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河北石家庄塔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625印张 256千字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9,000册

统一书号：10209.137 定价：1.75元

中国文学古代部分

(第二册)

讲稿目录

第三编 宋元文学……………(1)

概 说……………(1)

第一章 欧阳修……………(7)

第二章 苏 轼……………(19)

第三章 北宋诗文词……………(46)

第四章 陆 游……………(66)

第五章 辛弃疾……………(83)

第六章 南宋诗词……………(101)

第七章 宋元话本……………(119)

第八章 关汉卿……………(128)

第九章 王实甫……………(146)

第十章 元代散曲……………(155)

第四编 明清及近代文学……………(165)

概 说……………(165)

第一章 三国演义……………(171)

第二章 水浒传……………(184)

第三章	西游记	(202)
第四章	明代拟话本	(211)
第五章	牡丹亭	(220)
第六章	明代诗文	(230)
第七章	长生殿	(248)
第八章	桃花扇	(257)
第九章	聊斋志异	(266)
第十章	儒林外史	(284)
第十一章	红楼梦	(302)
第十二章	清初至清中叶的诗文词	(329)
第十三章	近代文学	(347)

第三编 宋元文学

概 说

为了讲授的方便，我们在“概说”里把宋代文学和元代文学放在一起来介绍，实际上宋元两代在文学风貌和文学成就上都是很不相同的。两宋历三百余年，时间长，作家多，作品丰富，诗文词都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取得新的成就，显示了自己的时代特色。同时为下层市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形式也开始蓬勃发展。话本小说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戏剧也初具规模，逐渐成熟，在体制和经验方面为元代杂剧的兴盛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宋代处于文学发展继往开来的时期，传统的诗、文、词和新兴的小说戏曲，都得到全面发展，文坛上出现一片纷披繁丽的景象。元代不足百年，时间短，作家作品的数量都不能跟宋代相比，传统的诗文词出现衰落，而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和酝酿，适应于时代的需要，在城市经济和市民阶层发展壮大基础上，产生了中国古典戏曲的成熟的形式——元杂剧。元代也有不少作家写作诗文词，但成就不高，传世的名篇几乎没有；而戏曲一体却独枝秀出，产生了不少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的戏剧家如关汉卿、王实甫等，显示了元代文学的独特成就和时代风貌。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代已开始走下坡路。两宋三百年间，一直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交互发展。宋代文学受到这些社会矛盾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反映了这些矛盾。

宋朝统治者在建国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但军权的高度集中，选拔文官当政，厚赏武将及南方诸国的降王降臣等，也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军队的战斗力削弱，官僚机构臃肿，统治阶级穷奢极侈、享乐腐化等等。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贵族政权辽、西夏和金，不断对宋王朝进行掠夺侵扰，而宋朝统治者则奉行一种屈膝投降、忍辱苟安的政策，每年向外交纳大量的绢帛银两。汉族统治者的挥霍无度和少数民族贵族阶级的贪得无厌，都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阶级矛盾在宋代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他们以同情的笔调描写了劳动人民被压迫剥削的痛苦生活。

民族矛盾的尖锐化激起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特别是金人南侵，在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以后，北宋沦亡，南宋统治者偏安江南，北方沦陷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纷纷组织义军，奋起抗金。反对民族压迫和侵略，发扬爱国主义，成为宋代特别是南宋的时代精神。因此这一时期爱国主义成为文学最突出的主题，产生了以陆游、辛弃疾为光辉代表的一批爱国主义作家。

为了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缓和社会危机，地主阶级中较有远见的政治代表先后发起了两次改良主义的政治革新运动，这就是仁宗时期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神宗时期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两次革新都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这就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庆历党争”和“新旧

党争”。这对宋代文学的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一些政治家同时也是文学家，他们将革新精神带进文学领域，促进了文学的革新。如支持范仲淹新政的欧阳修，就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在推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上也起了重要作用。科举考试由诗赋取士改为偏重策论，这也影响到当时的文风。许多古文家多写政论文，长于议论，表现出鲜明的政治色彩。变法以及由变法带来的现实生活的变化，在苏轼、王安石等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因变法而引起的新旧党争，使一些作家在政治上历尽坎坷，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思想和创作，苏轼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南宋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主战和主和两派力量的起伏消长，使揭露和批判卖国投降、歌颂和宣扬抗敌复国，成为爱国主义文学的重要内容。

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吸收融化了佛道思想而形成的理学（又称道学），对两宋文学的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强调道统，反对内容空虚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重道而轻文，是道学家文学观点的基本倾向。抹煞了文学的形象化特征，使宋代不少散文乃至诗歌，带有浓厚的封建说教意味，主理不主情，缺乏新鲜活泼的气息和艺术感染力。

宋诗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的，但学唐诗而不为唐诗所束缚，进行了新的开拓，有自己的特点。总的看，由于时代条件不同，宋诗没有象唐诗那样表现出阔大的气象，远大的理想和昂扬的精神，但宋诗在描摹客观事物时却更趋于细密深沉，往往锐意刻画，淋漓尽致，表现出与唐诗的蕴蓄浑成不同的意趣。宋诗重理趣，在表现客观事物时常常含寓着发人思索的哲理，跟唐诗的重意兴情韵，以情动人也有区别。

南宋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与本朝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正因为气象不同，才使宋诗在古典诗歌的高峰唐诗之后，还有自己的面目，在诗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严羽还总结了宋诗的三个特点是：“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指的是宋诗散文化的倾向，即把散文的表现手法引入诗中。唐代的杜甫、韩愈已开其端，宋人加以发展，成为普遍倾向。宋人又好在诗中言理，发议论。“以才学为诗”是指宋人喜欢摹拟和化用前人的诗句和好用典，表现自己博学多闻，发展到极端，就是追求所谓“无一字无来历”。这是宋诗的特点，也常常变成宋诗的流弊。有些写得不好的作品，有理无情，陷于抽象的说教，缺乏艺术感染力。

宋代散文是在继承唐代韩愈、柳宗元古文成就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韩愈的散文，有文从字顺的一面，也有奇崛艰涩的一面；宋代散文家避艰涩难懂而向平易晓畅方面发展。这种平易自然、流畅通俗的散文，便于叙事、说理、抒情，不仅在当时得到很大发展，产生许多优秀作品，而且对元明清各代的散文创作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宋文长于议论，逻辑性强，有充实的内容和鲜明的战斗特色。这跟宋代不少散文家同时又是政治家和学者分不开。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的不少名篇，都是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产生的。宋代的叙事散文和抒情散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宋词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发展到了极盛。宋初基本上沿袭晚唐五代的词风，内容多写男欢女爱、相思离别、宴饮游乐等，风格柔媚艳丽，也有少数清丽婉转之作。范仲淹、王安石等人的个别词篇已开始扩大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宋词到柳永而一变，到苏轼而再变。苏轼对词进行了一

次大的革新，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提高了词的意境，突破了音律的束缚，凡能写到诗里去的内容，如咏物、纪游、怀古、送别、赠答等，都能写入词中；他又在传统的婉约词风之外，创造了明丽清新、豪迈奔放等多种艺术风格。南宋辛弃疾等人继承并发展了苏轼的豪放词风，用词来抒写爱国情怀，感叹时事，进一步提高了词的表现力，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话本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市民阶层兴起的产物，是一种新兴的通俗文学形式。除了采用传统题材外，不少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受到了市民群众的广泛欢迎。话本为明清时期古典小说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杂剧是中国古典戏曲走向成熟的艺术形式，它的产生经历了长期的酝酿和发展过程。远古时代的原始歌舞和祭祀，春秋战国之际专门供人娱乐的俳优，汉代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汉魏以来在民间流行的杂舞、杂曲、唐代的参军戏等，都包含了构成中国古典戏曲的艺术因素。经过长期的孕育，在北宋杂剧和金院本的基础上，和宋金时期在民间流行、说唱结合的诸宫调相融合，便产生了杂剧的形式。

杂剧和散曲在元代最为繁荣，合称“元曲”。因其作品之丰富和在思想艺术上的杰出成就，成为元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形式，与“唐诗”、“宋词”并列而成为一代文学的专称。

杂剧在元代的繁盛，除了艺术本身发展的规律外，还取决于多方面的社会历史因素。元代蒙古贵族入主中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一直都十分尖锐。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杂剧这种将歌曲、宾白、舞蹈、表演

结合在一起的综合艺术形式，显然比简单的歌舞戏和说唱文学形式更能表现丰富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生活内容。杂剧受到群众的喜爱而得到繁荣发展，是很自然的事。杂剧要繁荣，剧本是基础。元代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最低，有所谓“九儒十丐”的说法，有的人连生计也难以维持。这迫使许多人投身下层，有机会跟广大群众结合，熟悉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为艺术创造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他们没有宋代知识分子那种通过科举考试在政治上发挥聪明才智的幸运，却正可以在艺术创作中大显身手。许多生活于城市下层，熟悉生活，与民间艺人结合的所谓“书会才人”，实际上是些从事杂剧写作的专业剧作家。他们不断创作出新的剧本来，便有力地推动着杂剧艺术的繁荣和发展。此外，元朝统治者向外开拓，中西方的交通联系和思想文化交流，以及元代社会开放性的活跃的思想文化因素，也都是促使杂剧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原因。而元代城市畸形繁荣，市民群众的娱乐场所“瓦舍”、“勾栏”比宋代更多，也为杂剧的演出、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散曲又称乐府或北乐府，是在我国北方民间流行的歌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诗体。散曲在元代文学中的地位不如杂剧，但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第一章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对宋代的诗文朝健康的道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宋初的诗文，承袭晚唐五代轻艳浮靡的文风，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于是诗歌方面出现了一些模仿唐人的派别。一个是以官僚文人李昉、徐铉等为代表的学习白居易“唱酬诗”为主的“白体”。除王禹称等个别人反映现实、成就较高外，绝大部分是酬唱赠答、吟玩情性的无病呻吟之作。另一个是“西昆派”，是学晚唐李商隐的，与倾向于浅近通俗的“白体”不同，“昆体”特别注重于艺术技巧，尤其讲求音律、对偶、词藻和用典。以当时的馆阁重臣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为代表。“西昆派”因杨亿所编的《西昆酬唱集》一书而得名。刘杨唱和，锤炼技巧，专在前人遗编中挹取“芳润”，而多缺乏现实内容和真情实感。这种以“雕章丽句”为特色的“昆体”，在宋初诗坛上风靡几十年之久。另外还有以林逋、魏野和一些和尚为代表的“晚唐体”，是学习晚唐贾岛、姚合的，内容多写闲居隐逸生活，讲究构思，诗风平淡清丽，影响不大。

散文方面，韩柳的古文传统中断，文人多写作讲求对偶、词藻、声律和用典的骈体文。宋初最早起来反对五代末

初的浮艳卑弱文风,提倡韩愈古文的是柳开(947——1000)。他主张作文应该“明道”,就是宣传儒家思想,但因为缺乏创作实践,影响不大。与柳开大体同时,有理论又有实践,在诗文创作上都取得较好成绩因而影响也较大的是王禹偁(954——1001)。他自称是“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早年学白居易晚期的酬唱诗风,后转而学白居易的早期诗风,继承“唯歌生民病”的精神;进一步又学习杜甫,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他论文主张“传道而明心”,传古人之道,同时又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又反对奥昧迂艰的文风,提出作文要“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就是要写得平易、浅近、流畅。他推崇并学习韩柳文章,着重朝平易畅达一面发展。但毕竟势孤力单,没有能够扭转时风。在他之后,文人仿作“西昆体”成为一时风气,用典使事,雕章琢句,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相率起来反对“西昆体”的有穆修、尹洙、石介、苏舜钦等人。其中最为激烈的是石介。但他是一位道学家,主要是从维护道统的角度提出问题,而重道轻文又使古文的发展产生新的流弊。范仲淹作为一个具有革新精神的政治家,也提出要改革文风,主张文章要有利于风俗教化,有现实内容,对当世的政治起积极作用。他在诗文词方面都有传世之作,对诗文革新起了积极作用,但并未形成高潮。

欧阳修所以能成为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掀起高潮,完成革新任务,为一代文风的建立做出巨大贡献,除时代条件(前人已作的努力,时代的需要等)外,主要是因为三个原因:一是他提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正确的古文理论;二是他能大胆地选拔人才,提携后进,团结志同道合的朋友,形成诗文革新运动的核心力量;三是他有丰富的创作实践,有作

品就能扩大影响，切实地推动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

欧阳修古文理论的基本内容是明道和尊韩。他主张道决定文，反对离开道去追求文章的丽和工。但他跟道学家的古文理论不同。他指的道不完全是抽象的儒家道统，而是包括了作家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现实社会内容在内，也就是所谓“关心百事”和“中于时病”，这就使得古文具有生动活泼的内容。同时，他强调道但不轻视文，主张文道统一，跟道学家的文道合一或文道对立不同。他提倡学习韩愈，并亲自编订韩愈文集。但他学韩而有分析，一方面是不生硬摹拟，有自己的面目；另一方面并不认为韩愈一切都好，他扬弃了韩文奇崛艰涩的缺点，而着重发展文从字顺的一面，为建立宋代散文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风格奠定了基础。

欧阳修对诗文革新运动的杰出贡献是排抑“太学体”的斗争。在道学家与古文家的相率反对下，到仁宗庆历末“昆体”便已走向衰竭。但古文运动内部却又产生一种深僻险怪的倾向，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科举考试的文章上，称为“太学体”。欧阳修为使宋代古文能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又跟这种险怪奇涩的文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以非凡的魄力，对写作“太学体”的士子一概黜落不选，而专取那些词义古质、平易通达的文章。就在这一次“生于草野，不学时文”的苏轼、苏辙兄弟受到他的奖掖而双双进士及第。此后，宋代的古文大家三苏、王安石和曾巩第人，便团结在欧阳修的周围，形成了诗文革新运动的中坚力量，推动着这一运动走向高潮并取得胜利。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欧阳修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提出的基本理论主张和进行的实际斗争，这一节我们讲欧阳修的文

学创作。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奠定了他在诗文革新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并扩大了这一运动的影响。

欧阳修诗歌、散文和词都有创作，主要成就在散文方面。欧文议论、叙事、写景、抒情都很好，议论文字说理透辟，叙事写景文字带有浓厚的抒情气息，而总的特色是平易畅达。他的各体文章都有充实的内容，文笔简练流畅，深入浅出而又纾徐唱叹，富有情致和艺术感染力。

欧阳修的散文传世名篇很多，我们这里选出议论文的代表作《五代史伶官传序》和写景抒情文的代表作《醉翁亭记》加以简要的分析。

先讲《五代史伶官传序》。

宋初薛居正曾奉诏撰写了一部《五代史》，后来欧阳修又独立撰写了一部，题为《五代史记》。为了跟薛撰区别，后人称为《新五代史》。《伶官传》是《新五代史》中一篇多人合传。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勖喜欢音律俳优，一些伶人（乐工、艺人）因此得到宠信，做了高官。《伶官传》就是记述庄宗的幸臣伶官敬新磨、景进、史彦琼和郭从谦等人的事迹的。这篇文章是放在《伶官传》前面的序论，作者对传中写到的一些历史事实发表评论，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为统治阶级提供鉴戒。

我们先看文章的内容。全文分为四段。第一段，以感叹的语气，开门见山地提出全文总的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兴盛或衰败的原因，虽说在于天命，难道跟人事没有关系吗？这里首先说明了本文要论述的不是一般的小问题，而是有关国家盛衰的大道理；进而提出他的看法，话说得很委婉，但是意思十分明确：国家盛衰的主要原因，不在天命，而在人事，在人的思

想和行为。开头不讲具体的人和事，而是摆出通过对具体的人和事分析概括而得出的思想认识。这样写，文章就显得高屋建瓴，旗帜鲜明，不仅显出理论的高度，而且很有气势和魄力。然后说：“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原”是推原、考察的意思。这是说，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后唐庄宗得到天下和失掉天下的原因，也就明白这个道理了。这一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提示读者，这篇文章就要通过后唐庄宗的事例来说明上面提出的论点。这段开头只有两句话，很简练，同时又很鲜明有力。“盛”“衰”“得”“失”四个字，规定了文章将要引用的史实以及评论的重点和范围。

第二段就紧承开头引述史实。大意说，据传晋王李克用在临终的时候，拿出三支箭来交给儿子庄宗李存勖，并告诉他说：“后梁太祖朱温（后来改名朱全忠）是我的仇人；燕王刘守光的父亲刘仁恭是因为我的保荐才发展起来的，后来背晋而归了梁；契丹的首领耶律阿保机曾跟我结拜为兄弟，后来也背约而附梁。这三件事是我的终生遗恨。给你三支箭，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父亲的遗志。”庄宗接受了箭并把它藏在宗庙之中。以后出兵打仗，就派官员带着猪羊等供品到宗庙里去祭告，然后取出箭，放到锦囊里，背着它跑到队伍的前面，等到取得胜利再送回宗庙。这段文章也不长，但是概括了丰富的历史事实，写得既简要又具体形象。晋王李克用临终时的一段话，写得非常生动，把人物的语气和感情都传达出来了，这就为下文写庄宗的报仇雪恨和发愤图强打下基础。写庄宗用兵，略去了具体过程，只写他负矢出征的情形，以突出他不忘父亲的遗训，兢兢业业为报仇雪恨而艰苦奋斗。这段文章全是叙述，没有议论，但思想却包含在事实

之中。对第一段说，是通过史实具体写“庄宗之所以得天下”；对最后一段说，又为“忧劳可以兴国”的结论提供事实依据。行文从容舒缓，前后的内在联系却十分紧密。

第三段，作者以高度精炼的笔墨，极概括地写庄宗由盛而衰的得失成败之迹。作者说：当庄宗俘虏了燕王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把梁末帝朱友贞和他臣下的首级用匣子装着送到太庙里去祭奠亡父，把箭还回去，告诉他仇人已经消灭，遗志已经实现的时候，他那昂扬的精神意气是多么豪壮啊！前面写晋王有三桩遗恨，这里写庄宗的武功却只写了两件，这是以实带虚，不求件件落实。剪裁得当，文章就显得简括干净。“及仇讎已灭”以下写庄宗的衰败，给人以急转直下之感，并渲染出浓重的气氛。然后发出“何其衰也”的感叹，与前面“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形成对比。写盛衰两个方面，略盛而详衰，这是为了下文便于总结教训，突出文章的中心思想。所以这段的末尾作者意味深长地提出问题：难道是得天下难而失掉天下很容易么？或者是考察那成功和失败的事迹，一切都是由人自己造成的呢？引导读者去思索，以便更好地接受他的结论。

第四段是全文的总结，得出结论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剴切，肯定，很有力量。上一段写庄宗败亡，只摆出事实，没有揭示出原因，这里点出“逸豫”（追求安逸享乐）两个字，并补叙一笔：“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从“逸豫”引出“数十伶人”，照应到《伶官传》的题目。作者总结历史教训，从庄宗宠幸伶官出发，却又不局限在这一点上，进而概括出更加普遍的意义：“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意思是：祸患常常是由细小的事情积累发展起